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
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几篇文章

人 民 出 版 社

04.3
211.3
C.3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 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几篇文章

34992 / 21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
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几篇文章**

*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印刷四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2.5印张 55,000字
1974年9月第1版 1974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1001·936 定价0.17元

出版说明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的《序言》中指出，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考虑到沙皇政府的书报检查，对政治方面的意见不得不用暗示的方式来表述。因此，列宁说，读者如果对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社会沙文主义是彻底地背叛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分裂是同帝国主义相联系的等等问题关心的话，可以阅读他在1914—1917年在国外发表的有关论著。为了适应广大读者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学习《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需要，进一步认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和历史趋势，认识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和任务，批判新老修正主义的反动谬论，我们辑选了列宁的几篇有关论著，编成本书。

书中文章是按写作或发表时间的顺序排列的。译文采自《列宁选集》或《列宁全集》。对注释作了一些增删。

人民出版社编辑部

一九七四年五月

目 录

打着别人的旗帜.....	1
论欧洲联邦口号.....	23
机会主义和第二国际的破产.....	28
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	43
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	56
修改党纲的材料 (摘录)	74

31318

打着别人的旗帜*

《我们的事业》^①第1期(彼得格勒,1915年1月)登载了亚·波特列索夫^②先生的一篇极有代表性的纲领性文章:《在两个时代的交界点》。跟这位作者前些时候在一本杂志上登载的一篇文章一样,这篇文章叙述了俄国整个资产阶级社会思想流派即取消派对当今重要而迫切的问题的基本观点。其实摆在我们面前的不是文章,而是一个派别的宣言。只要仔细读一读这些文章,想一想这些文章的内容,谁都会看出,只是因为考虑到一些偶然的、即与写作的利益毫无关系的因素,作者(和作者的朋友们,因为作者不是孤单的)才没有用宣言或“信条”这种更适当的形式把自己的思想表述出来。

亚·波特列索夫的主要意思,是说现代民主派处在两个时代

* 《打着别人的旗帜》一文,列宁写于1915年2月以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4年爆发后,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首领们,在“保卫祖国”的口号下,背叛社会主义,追随本国的资产阶级政府,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堕落为社会沙文主义者。俄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波特列索夫等人,打着国际主义的旗帜,偷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私货。他们抹煞不同时代不同的阶级内容和社会内容,混淆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时代同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的区别,把资产阶级进步时期要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思想拿来为他们在资产阶级已经反动、腐朽的时代支持帝国主义战争、“保卫祖国”的反动立场辩护,以欺骗工人群众,掩盖自己背叛无产阶级的罪恶行径。列宁在这篇文章中,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俄国社会沙文主义者的谬论,对时代问题作了重要论述。

① 《我们的事业》,俄国孟什维克的杂志。

② 亚·波特列索夫(1869—1934),俄国孟什维克的首领之一,社会沙文主义者。

的交界点，而旧时代和新时代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从民族狭隘性过渡到国际性。亚·波特列索夫所说的现代民主派，是指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民主派，它与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前的资产阶级旧民主派不同。

乍看起来，可能觉得作者的思想绝对正确，觉得作者是一位反对今天在现代民主派当中占统治地位的民族自由派的人，是一个“国际主义者”，而不是民族自由主义者。

的确，捍卫国际主义，把民族狭隘性和民族特殊性看作过去旧时代的特点，这岂不是同民族自由主义这种流行病，同现代民主派（确切些说，现代民主派的正式代表）的这种瘟疫断然决裂么？

乍看起来，不但可能，而且几乎必然会是这样。可是，这是根本错误的。作者是打着别人的旗帜，偷运自己的货色。他用了一个很小的军事机智（不管他是不是故意这样做，反正都是一样），打出一面“国际主义”的旗帜，想在这面旗帜下面稳稳地偷运民族自由主义私货。因为亚·波特列索夫是一个明显不过的民族自由主义者。他的文章（和他的纲领，他的政纲，他的“信条”）的全部实质，就是用了这个很小的可说是幼稚的军事机智，打着国际主义的旗帜，偷运机会主义。这种实质必须十分详尽地加以说明，因为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大问题。而亚·波特列索夫打着别人的旗帜之所以更加危险，是因为他为了掩饰自己，不但搬出了“国际主义”的原则，而且还自称为“马克思的方法论”的拥护者。换句话说，亚·波特列索夫想当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继承者和代表者，而实际上他是用民族自由主义偷换马克思主义。亚·波特列索夫想“纠正”考茨基^①，责备他的“律师手法”，就是说，责备他一会儿替这个民族

① 考茨基（1854—1938），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首领之一。第

色彩的自由主义辩护，一会儿又替那个民族色彩的自由主义辩护。亚·波特列索夫想用国际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来反对民族自由主义（因为毫无疑问，考茨基已肯定地成为民族自由主义者了）。实际上，亚·波特列索夫是用清一色的民族自由主义来反对杂色的民族自由主义。而马克思主义是反对一切民族自由主义的，在当前的具体历史环境里，在各个方面都是如此。

是否真是这样，为什么是这样，现在我们就来谈谈。

—

使亚·波特列索夫在民族自由主义的旗帜下打转的不幸的关键就在于他文章里的下面这段话，如果读者仔细思索一下，就很容易了解：

……“不管问题多么复杂，他们（马克思和他的同志们）总是秉着固有的气质前去克服，他们对冲突作出诊断，他们力求判断哪一方胜利会为他们所希冀的前途开辟更广阔的天地，从而为制定自己的策略打下一定的基础”（第73页，引文中的着重号是我们加的）。

“哪一方胜利比较好”——这是须要判断的，然而须要从国际的观点而不是从民族的观点来判断；这就是马克思方法论的实质；考茨基正因为没有这样做，所以从“法官”（马克思主义者）变成了“律师”（民族自由主义者）。这就是亚·波特列索夫的思想。亚·波特列索夫深信：自己坚持某一方（就是自己那一方）胜利比较好，决不是“耍律师手法”，而是从真正国际的观点出发，考虑到另一方

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考茨基是所谓“中派”，即以隐蔽的手法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十月革命后，考茨基公开反对十月革命，疯狂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彻底暴露了他的机会主义和叛徒面目。

有“难以想象的”罪恶……

波特列索夫、马斯洛夫^①、普列汉诺夫^②等人都是根据真正国际的观点，得出了与波特列索夫相同的结论……这真是幼稚到……但是，我们不要扯得太远了，还是先把纯理论性的问题分析清楚吧。

马克思曾经判断过“哪一方胜利比较好”的问题，比如在1859年意大利战争^③的时候就是如此。亚·波特列索夫所谈的，正是这个“由于具有某些特点而对我们有特别意义”的例子。我们也同意用亚·波特列索夫选择的这一个例子。

1859年拿破仑第三向奥地利宣战，似乎是为了解放意大利，其实是追求自己王朝的目的。

亚·波特列索夫写道：“在拿破仑第三的背后出现了刚刚同法国皇帝缔结秘密协定的哥尔查科夫^④这个人物。”矛盾错综复杂：一方是压迫意大利的欧洲最反动的君主国，另一方是包括加里波第^⑤在内的争取解放的革命意大利的代表人物同反动透顶的拿破仑第三并肩携手等等。亚·波特列索夫写道：“何必自找麻烦呢，干脆说一声‘双方都坏’，岂不更简单么？但是，恩格斯、马克思、拉

① 马斯洛夫(1867—1946)，俄国的孟什维克，社会沙文主义者。

② 普列汉诺夫(1856—1918)，原是俄国的民粹主义者，曾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后堕落为修正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者，成为俄国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右派的首领之一。

③ 1859年意大利战争，指1859年法国和意大利对奥地利的战争。法国皇帝拿破仑第三与意大利的萨丁王国订立密约，以取得意大利的萨瓦和尼斯两地为条件，出兵帮助意大利收复被奥地利占领的土地。

④ 哥尔查科夫(1798—1883)，俄国外交大臣。1859年3月，俄法签订密约，俄国支持法国反对奥地利，法国支持俄国取消巴黎条约中关于禁止俄国在黑海保存舰队的条款。

⑤ 加里波第(1807—1882)，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民主主义者。

萨尔^①都没有被这种“简单”的解决办法所迷惑，而是着手探寻”（亚·波特列索夫想说：着手研究和分析）“冲突怎样结局才对他们所珍视的事业最为有利。”

与拉萨尔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普鲁士应当干预。亚·波特列索夫自己承认，在他们所考虑的问题当中，有这样一些问题：“由于同敌对联盟冲突，德国的民族运动可能产生，可能违背德国许许多多统治者的心意而发展起来；在欧洲的共同行动上，哪一个大国是祸患的中心；是多瑙河沿岸的反动君主，还是这种共同行动中的别的著名代表人物。”

亚·波特列索夫推论说：是马克思对或是拉萨尔对，这对我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都一致认为必须根据国际的观点来判断哪一方胜利比较好。

这就是亚·波特列索夫所举的例子；这就是我们的作者的议论。亚·波特列索夫推论说：既然马克思当时能够不顾交战双方的政府都极为反动而“估计国际冲突”（亚·波特列索夫的说法），那末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应该作同样的估计。

这个推论真是太幼稚了，这种诡辩真是太笨拙了，因为这无非是说：既然马克思在1859年解决了什么样的**资产阶级胜利比较好**的问题，那末在五十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们也应该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亚·波特列索夫**没有看到**，在1859年（和后来的一系列事件中），马克思认为“哪一方胜利比较好”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什么样的**资产阶级胜利比较好**”的问题。亚·波特列索夫**没有看到**，在

① 拉萨尔（1825—1864），德国工人运动中第一个机会主义头子。他宣扬通过争得普选权和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实现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理论。他暗中与反动宰相俾斯麦勾结，支持普鲁士“自上而下”统一德国的反革命政策。

克思解决这个我们都知道的问题的时候，当时存在着无疑是**进步的资产阶级**运动，这种运动不但存在，而且在欧洲最重要的国家的历史过程中占着首要的地位。在我们今天，如果认为象英德这样一些无疑是欧洲“共同行动”中主要的和最重要的角色，还有进步的资产阶级，有进步的资产阶级运动，那就可笑了。在这些主要的和最重要的大国里，资产阶级旧“民主派”已经是反动的了。而亚·波特列索夫先生却“忘记”这一点，用**旧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派的观点来偷换**现代的**（非资产阶级的）民主派的观点。这样去采取另一个阶级而且是衰亡的旧阶级的观点，是十足的机会主义。对新旧两个时代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的分析，决不会说明这样做是对的。

正是资产阶级才力图玩弄亚·波特列索夫那种偷换的把戏，用资产阶级进步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和民主解放运动的时代来偷换帝国主义时代，比如德国资产阶级就是这样，英国资产阶级也是这样。亚·波特列索夫毫无批判地跟着资产阶级走。更不能原谅的是，亚·波特列索夫本人举这个例子的时候，就应该承认和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在早已过去的时代里考虑的是什么样的问题〔一〕。

〔一〕 顺便提一提，亚·波特列索夫不愿意判断这个问题：对1859年战争的条件的估计，是马克思对还是拉萨尔对。我们（与梅林^①的意见相反）认为，马克思是对的，而拉萨尔在当时，也象他向俾斯麦^②献媚的时候一样，是机会主义者。拉萨尔设法使普鲁士和俾斯麦胜利，使德意两国的民族民主运动没有足够的力量。于是拉萨尔就动摇到民族自由主义工人政策方面去了。马克思则提倡和发扬独立的、彻底民主的、反对民族自由主义懦弱行为的政策（如果1859年普鲁士出面反对拿破仑，就会推动德国的人民运动）。拉萨尔的眼睛不是朝下，而多半是朝上，瞅着俾斯麦。俾斯麦的“胜利”，决不能说明拉萨尔的机会主义是对的。——列宁原注

① 梅林（1846—1919），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历史学者，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领导人之一。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拉萨尔和拉萨尔派的斗争中，梅林有错误认识。

② 俾斯麦（1815—1898），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宰相，工人运动的死敌。他以血腥的反革命方法实现了德国的统一。

第一、他们所考虑的是民族运动(德国和意大利的),是如何使民族运动违反“中世纪代表人物”的心意而发展起来;第二、他们所考虑的是欧洲共同行动中的反动君主国(奥地利君主国、拿破仑君主国等等)是“祸患的中心”。

这些看法是十分清楚和无可争辩的。马克思主义者从不否认反对封建专制势力的资产阶级民族解放运动的进步性。亚·波特列索夫不会不知道,在我们这个时代,在中心的即发生冲突的几个最主要最重要的国家里,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这类东西**。过去在意大利和德国发生的都是长达**数十年**的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当时并不是西方资产阶级在财政上支持其余的几个大国,相反地,这些大国才**真正**是“祸患的中心”。亚·波特列索夫不会不知道,而且他自己在那篇文章里也承认,在我们这个时代,其余的**任何一个**大国,都不是也不可能是“祸患的中心”。

资产阶级(比如德国资产阶级,虽然决不止它一个)为了自私自利的目的,煽起民族运动的思想,力图把这种思想搬到帝国主义时代,即完全不同的时代来。机会主义者跟往常一样,总是跟在资产阶级的后面,**抛弃现代**民主派的观点,采取**旧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派的观点。这就是亚·波特列索夫和他的取消派伙伴们所有的论文、立场、路线的根本罪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旧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派的时代解决了什么样的资产阶级胜利比较好的问题,是想使小规模的自由主义运动发展为蓬蓬勃勃的民主运动。而在**现代的**(非资产阶级的)民主派的时代,在英德法等国根本谈不上什么资产阶级进步运动、什么小规模的自由主义运动和蓬蓬勃勃的民主运动的时候,亚·波特列索夫却来鼓吹资产阶级民族自由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自己的**时代,即资产阶级民族进步运动的时代**前进**了一步,推进了**这些**运动,设法使这些运动“违反”中世纪

代表人物的“心意”而发展起来。

亚·波特列索夫，和所有社会沙文主义^①者一样，从自己的现代民主派的时代向后倒退，转到早已过时的、陈腐的因而实际上是虚伪的旧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派的观点。

因此，亚·波特列索夫向民主派发出的下面的这个号召，是极为糊涂、极为反动的。

……“不要后退，而要前进。不要走向个人主义，而要走向十分完整的、十分有力量的国际意识。前进，在某种意义上说来也是后退；后退到恩格斯、马克思、拉萨尔那里去，运用他们估计国际冲突的方法；象他们那样，把各国的国际行动都用于民主主义的目的”。

亚·波特列索夫不是在“某种意义上”而是在一切意义上拖着现代民主派后退，恢复旧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口号和思想，使群众依赖资产阶级…… 马克思的方法首先是考虑具体时间、具体环境里的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以便首先了解，在这个具体环境里，哪一个阶级的运动是可能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当时，在1859年，欧洲大陆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不是帝国主义，而是民族资产阶级解放运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势力的运动是主要的动力。过了五十五年，站在原来反动封建主地位上的已经是和反动封建主一样的老朽资产阶级的金融资本巨头了，而聪明过人的亚·波特列索夫还想用资产阶级的观点，而不用新阶级的观点来估计国

① 社会沙文主义，沙文主义是资产阶级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因法国士兵沙文狂热拥护拿破仑第一的侵略扩张政策而得名。社会沙文主义就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沙文主义，它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产生的。这次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首领们，在“保卫祖国”的口号下，公然放弃革命斗争，投票赞成军事预算，积极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完全堕落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

际冲突〔一〕。

亚·波特列索夫没有好好想一想他这些话里的真理有什么意义。假定在资产阶级民族解放运动时期有两国交战。从当时的民主派的观点看来，希望哪一国胜利呢？显然是希望能够更有力地推动、更激烈地发展资产阶级解放运动、更有力地摧毁封建制度的那个国家胜利。其次，假定客观历史环境的决定因素变了，争取民族解放的资本已经被国际的、反动的、帝国主义金融资本代替了。假如一部分人占了非洲的四分之三，另一部分人占了四分之一。他们的战争的客观内容就是重分非洲。希望哪一方胜利呢？还象过去那样提问题，那简直是荒唐之至，因为过去的估计的标准，无论是资产阶级解放运动发展的长期过程，或者是封建主义崩溃的长期过程，现在都不存在了。无论是帮助前者巩固其四分之三的非洲的“权利”，或者是帮助后者（虽然后者在经济上比前者发展得快）夺取这四分之三，都不是现代民主派的事。

只有不附和任何一个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只有说“双方都坏”，只有希望每个国家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失败，只有这样，现代民主派才是正确的。其余的一切决定，实际上都是民族自由主义，同真正的国际主义毫无共同之点。

但愿读者不要上亚·波特列索夫的奇异术语的当，他是用这些术语来掩饰他采取资产阶级观点的事实的。亚·波特列索夫喊道：“不要走向个人主义，而要走向十分完整的、十分有力量的国际意识。”这是他拿自己的观点来反对考茨基的观点。他把考茨基（和

〔一〕 亚·波特列索夫写道：“实际上，正是在这个似乎是停滞的时期，各国国内都发生了极大的分子分裂过程，国际环境渐渐变质了，因为夺取殖民地和穷兵黩武的帝国主义的政策愈来愈明显地成了国际环境的决定因素。”——列宁原注

考茨基之流)的观点叫做“个人主义”，意思是说考茨基不去估计“哪一方胜利比较好”，同时为每一“个别”国家的工人的民族自由主义辩护。他说，可是我们，亚·波特列索夫、切列万宁^①、马斯洛夫、普列汉诺夫等，呼吁“十分完整的、十分有力量的国际意识”，因为我们主张一个色彩的民族自由主义，决不是从个别国家的观点(或个别民族的观点)出发，而是从真正国际的观点出发的……这种议论如果还不算很……可耻，那至少很可笑。

不管是亚·波特列索夫之流还是考茨基都当了资产阶级的尾巴，背叛了他们竭力想代表的那个阶级的观点。

二

亚·波特列索夫给自己的文章加的标题是：《在两个时代的交界点》。无可争辩，我们是生活在两个时代的交界点，而且只有首先分析了从一个时代转变到另一个时代的客观条件，才能够了解我们面前发生的极其重大的历史事件。这里谈的是历史上的大时代，无论过去或将来，每个时代都有个别的、局部的、时而前进时而后退的运动，都有脱离一般运动和运动的一般速度的各种倾向。我们无法知道，这个时代的某些历史运动的发展会有多么快，有多么顺利。但是我们能够知道，而且确实知道，**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只有在这种基础上，即首先估计到区别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历史上的个别情节)，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认清了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我们才能以此为根据来估计这国或那国的更详细的

^① 切列万宁(1868—1938)，俄国孟什维克的首领之一，社会沙文主义者。

特点。

亚·波特列索夫和考茨基(他的文章登在同一期的《我们的事业》杂志上)的诡辩的根本之点,或者说,两个人所共有的、使两人得出了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民族自由主义的结论的根本的历史性错误,正是在这一方面。

因为,亚·波特列索夫举出的 1859 年意大利战争这个对他有“特别意义”的例子,以及考茨基举出的历史上的许多类似的例子,“恰恰不属于”我们生活于其“交界点”的“那些历史时代”。我们正在进入(或者已经进入,但还在开始阶段)的时代,我们叫做现代(或第三个时代)。我们刚刚走过的时代,叫做昨天的时代(或第二个时代)。亚·波特列索夫和考茨基举了许多例子的那个时代,我们就叫做前天的时代(或第一个时代)。亚·波特列索夫和考茨基的议论当中那种令人愤慨的诡辩和难以容忍的谎言,就是他们用前天的时代(第一个时代)的条件来偷换现代(第三个时代)的条件。

我们来看看吧。

通常把历史时代划分为三个时期:(1) 1789—1871 年;(2) 1871—1914 年;(3) 1914—?。这在马克思主义的文献里多次引用过,考茨基不止一次地重复过,亚·波特列索夫在自己的文章里也是这样运用的。当然,这里的界限跟自然界和社会上所有的界限一样,是有条件的、活动的、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我们只是大致地挑出那些特别突出、引人注目的历史事件作为大的历史运动的路标。第一个时代是从法国大革命到普法战争,这是资产阶级上升的时代,是它的全盛时代。这是资产阶级上升的阶段,一般说,这是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时代,特别是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时代,是迅速摧毁过时的封建专制制度的时代。第二个时代是资产

阶级绝对统治和衰落的时代，是从进步的资产阶级变成反动的和最反动的金融资本的时代。这是新的阶级即现代民主派准备和慢慢聚集力量的时代。第三个时代才刚刚开始，在这个时代里，资产阶级处于第一个时代的封建主所处的“地位”。这是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动荡和由帝国主义引起的动荡的时代。

不是别人正是考茨基自己在一系列论文和《取得政权的道路》这本小册子(1909年出版)里，十分肯定地描述过正在进入的第三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指出了这个时代同第二个时代(昨天的时代)的根本区别，认为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变化，现代民主派直接的任务以及斗争的条件和形式已经改变。现在，考茨基把自己过去崇拜的东西烧毁了，而最令人难信地、最不体面地、最无耻地把阵线变换了。在上述小册子里，他直接说出了战争即将到来的征兆，而且说的正是1914年发生的战争。只要把这本小册子的一些地方同考茨基今天的大作对比一下，就会确信考茨基背弃了自己本人的信念和最庄重的声明。在这方面，考茨基并不是绝无仅有的人物(而且决不只是德国的现象)，在危机的关头滚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所有现代民主派上层分子当中，他不过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人物而已。

亚·波特列索夫和考茨基所举的历史上的例子，都是属于第一个时代的。不但在1855、1859、1864、1866、1870年的战争时期，而且在1877年(俄土战争)和1896—1897年(土希战争和阿尔明尼亚的骚动)的战争时期，历史现象的主要客观内容，都是资产阶级民族运动或资产阶级社会力求从各种封建制度下解放出来的“痉挛”。在许多先进国家里，当时根本谈不上什么现代民主派的那种真正独立的、与资产阶级过熟和衰落的时期相适应的行动。当时，在这些战争中，资产阶级是主要的阶级，它参加这些战争，处在